

《四庫全書總目》的「根柢」觀探究 ——經學視野下的文學觀

劉德明*

摘 要

本文主要目的在探討四庫館臣於乾嘉經學昌熾之際，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文學創作觀所產生的種種影響。其實研究《四庫全書總目》的學者亦多注意到當時經學勢力對文學觀有所影響，但卻極少討論《四庫全書總目》中所經常用以評價的詞彙究屬何意並探究其中所涵蘊之問題。故筆者擬以四庫館臣所標舉「漢學具有根柢」的「根柢」一詞做為核心，探究「根柢」一詞之義並討論其所使用的範圍與方式、論述「根柢」如何被用來做為文章的評價標準，及進一步討論文與詩兩種不同文體之創作與根柢的複雜關係。

關鍵詞：四庫全書總目、根柢、經學、漢學、宋學

* 中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第六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



《四庫全書總目》的「根柢」觀探究

——經學視野下的文學觀

劉德明

一、前言

清朝乾隆皇帝修纂《四庫全書》在文化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其背後動機眾說紛紜。大致而言可分成乾隆皇帝個人目的及客觀學術發展的脈絡兩方面來看¹。就乾隆之個人目的而言：或說因乾隆好大喜功，欲成編成一部遠超《太平御覽》、《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等叢書，以展現其文治之功；或說其希望透過編定《四庫全書》以籠絡文人之心，另一方面亦可以查核圖書內容，達成思想統制的目的。也有學者從乾隆深受中國傳統影響，自認皇帝兼具「知識份子」

¹ 以下幾種說法，除楊晉龍之說外，其餘均為歷來學者所最常提及。參見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上海：上海書店，1992年），頁1-4。吳哲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0年），頁10-23。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4-14。劉薈：〈「四庫七閣」始末〉，收入《兩岸四庫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頁274。

及「統治者」的身分，乾隆之所以要編定《四庫全書》主因是著眼於「教化」²。至於從學術歷史發展因素立論則或以清代考據學風興起，漢學逐漸取代理學而成爲學術界的主導力量，順應此種學風而有編纂大部叢書之必要，由此得以說明爲何在乾隆時期同時有《四庫全書》之編定與漢學家輩出之情況。

《四庫全書》從乾隆 38 年(1773)年成立四庫館開始，至乾隆 46 年(1781)第一部《四庫全書》抄成，以皇家之力耗費多年方才完成，共收書三千四百多種。這規模宏大的《四庫全書》在著手採編之時，安徽學政朱筠即上書乾隆，主張在編纂《四庫全書》的同時，亦應著手編撰一部《四庫全書》的目錄提要。朱筠的這個提議立即爲乾隆所接受，所以《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與《四庫全書》之編纂同步進行³。《總目》共 200 卷，除了四庫所著錄的圖書之外，也旁及四庫未收錄的書籍。《總目》不僅是《四庫全書》的書目提要，它同時也代表《總目》作者對學術源流及評價等等看法。事實上，若就學術研究角度而言，《總目》似乎較《四庫全書》更具價值⁴。

由於《總目》是代表四庫館臣對於《四庫全書》所收各種圖書的簡介及評述，有著闡明學術、考鏡源流的功用，它同時也成爲乾隆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學術

² 楊晉龍：〈《四庫全書》訂正析論：原因與批判的探求〉，收入《兩岸四庫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 年)，頁 337-373。

³ 關於《四庫全書總目》之編纂過程，請參見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頁 209-211。吳哲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頁 110-112。司馬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頁 1-3。又關於《四庫全書總目》之書名或多有稱之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依楊晉龍：〈「四庫學」研究的反思〉(《中國文哲研究所集刊》，1994 年第 4 期)，此書實應名爲《四庫全書總目》爲妥，而「提要」是指內容而言，並非書名。但因《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名由來已久，故引述各學者使用此名之論述時，筆者亦不加改正。

⁴ 楊晉龍：〈「四庫學」研究的反思〉。楊晉龍在此文中認爲《四庫全書》是「舊存而刪改」，而《總目》則爲原創，較能「見其所以然」。所以《總目》較《四庫全書》更具有研究價值。

著作⁵。所以對《總目》中各種評述的研究，自然也成為理解乾隆時期學術思潮的重要工作。四庫館臣在撰寫《總目》之時也深有此自覺，所以其書中亦多評述歷代學術特點，其中最有名的當是將由漢至清的學術流變歸總為六種變革：

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詰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學脈旁分，攀緣日衆，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才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談臆斷，考證必疎，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微實不誣，及其弊也瑣。⁶

從兩漢的恪守師說至清初的徵實之學，其間不但標舉出各時代學風的特色，亦同時指出其缺點與限制。四庫館臣在歷述各時代不同的學風後，更將其進一步化約為漢學、宋學兩種治學風格：

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

⁵ 《總目》之作者為誰，學者間有不同看法，如周積明：《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頁4-5。主張《總目》中最主要為紀昀的看法，其云：「《總目》與紀昀的思想血脈相通」。但司馬朝軍在《《四庫全書總目》研究》的第一章〈《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略〉中，則舉出許多例子說明《總目》「是集體創作而非一人所為」（頁115）。筆者的立場近於司馬朝軍，故以下稱《總目》之作者皆以「四庫館臣」來代表。

⁶（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經部總敘〉（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49。此段中本有《總目》所引以為證的例子，因文長且無關本文論述重點，所以將其省略。

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疎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⁷。

漢學、宋學各有其特點：漢學之說有「根柢」、宋學則「精微」。雖然彼此以「淺陋」、「空疏」相互攻擊，但是四庫館臣認為樣的批評這並不能使漢學家與宋學家心服。重要的是要能消融漢學、宋學的門戶之見，方才能去除私心而見公理。從文字表面上來看，四庫館臣似乎要平息所謂的「漢、宋之爭」，進一步兼採漢學與宋學的長處以治學。但事實上卻未必如此，如梁啟超即認為：

露骨的說，四庫館就是漢學家的大本營，《四庫提要》就是漢學思想的結晶體。就這一點論，也可以說是：康熙中葉以來漢宋之爭，到開四庫館而漢學派全占勝利⁸。

四庫館臣的觀點偏向漢學，這幾乎是學術界共同的想法⁹，薛力新亦言：「清代漢學的學術特點，明顯地體現在《總目》的部敘、類敘、案語之中。¹⁰」在這樣的學術氣氛下，四庫館臣對於文學的諸多看法即值得我們進一步加以探究。

究實而論，漢學、宋學的分別本是對於儒學經典理解與內容的爭議，但是乾隆纂集《四庫全書》時即以儒學為中心¹¹，而經學又是儒學的核心。所以四庫

⁷ 《總目·經部總敘》卷1，頁49。

⁸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58年），頁22。

⁹ 如張麗珠：〈紀昀反宋學的思想意義〉，《漢學研究》第20卷第1期。即以《總目》與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為例，說明紀昀對宋學「尊漢抑宋」、「崇實黜虛」的立場。

¹⁰ 薛新力：〈清代漢學思潮對《四庫全書總目》之影響〉（《圖書館論壇》，2002年8月）。

¹¹ 黃愛平：〈《四庫全書總目》的經學觀與清中葉的學術思想走向〉，收入《兩岸四庫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頁83。黃氏《四庫全書纂修研究》頁383。即提出《總目》的思想內容是以「尊崇儒學，提倡封建倫理觀念」為主，兩文的小標題不同，但看法一致，均認為《總目》在諸子百家中仍以儒學為宗。

館臣傾向漢學的學術立場便會有意無意的擴散至對文學的諸多觀點之中。這即是本文所欲討論的重點：在「經學」為主視野下的「文學」觀。正如前文所引，四庫館臣認為「漢學具有根柢」，「根柢」一詞為漢學家所高舉的重要標誌¹²，所以筆者即擬以《總目》集部中「根柢」一詞的使用情況，探究《總目》中的文學觀念。

二、「根柢」在《總目》中之用法與意涵

「根柢」一詞的使用極早，至少在《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中即有「蟠木根柢，輪囷離詭」之句，它本來是指草木的根部，後有「根據」、「來源」之意。《總目》中亦偶用此義，將「根柢」做為純粹描述用，如：

《儀禮》不專言喪服，而古來喪服之書則例附於《儀禮》。蓋《周官》凶禮無專門，《禮記》又《儀禮》之義疏，言喪服者大抵以《儀禮》為根柢，故從其本而類附也¹³。

這是四庫館臣基於學術源流的判斷，對《總目》的分類做出說明：《儀禮》內容雖然不僅只有喪禮，但因對喪服的記載最豐，故歷來對喪禮研究的主要根據即是《儀禮》。徐乾學的《讀禮通考》一書雖以「禮」為名，但其內容專以喪禮為主，故《總目》將《讀禮通考》歸於《儀禮》研究的相關類目中，而非將其歸為《禮

¹² 如在清儒漢學考證方面取得非常重要成果的閻若璩所著《尚書古文疏證》一書中，即大量使用「根柢」一詞來論述其說。詳見許華峰：「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的辨偽方法」（中壢：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第三章〈《尚書古文疏證》的「根柢」論證〉，頁65-118。

¹³ 《總目·禮類二·儀禮》，卷20，頁555。

記》類。在這裡「根柢」一詞為描述性用法，並沒有好壞優劣的判斷。但「根柢」具有本源之意，所以在語意脈絡中很容易發展出崇本判斷的價值意思。於此《總目》大部份用「根柢」一詞對其所學來源做描述之後，通常也會附上種種價值判斷，如：

其學根柢於三禮，故其釋《春秋》也，亦多以《禮經》為根據，較宋元以後諸家空談書法者有殊¹⁴。

《春秋》歷來號稱難解，清儒毛奇齡說解《春秋》者「臆猜卜度，如說夢話」¹⁵，各有不同的說解。萬斯大除著《學春秋隨筆》外尚有《儀禮商》一書，四庫館臣認為萬斯大的學問根據主要是禮學，所以其詮解《春秋》亦是根據他對三禮的理解而發。這本是學術尋根探源的判斷，但《總目》將萬氏之《春秋》學與宋元《春秋》名家的詮解方法相互比較後，將宋元諸家斷為「空談書法」，於是「根柢」一詞除了描述的用法外，還具有正面評價性的意義。在《總目》中尚有許多例子將「根柢」做為類似的用法：

自王弼《易》行，漢學遂絕，宋、元儒者類以意見揣測，去古浸遠……故說經之家莫多於《易》與《春秋》，而《易》尤叢雜。棟能一一原本漢儒，推闡考證，雖掇拾散佚，未能備睹專門授受之全，要其引據古義，具有根柢，視空談說經者則相去遠矣¹⁶。

王弼不以漢儒的象數解《易》，宋、元儒者亦不循漢儒解《易》途徑，競相以自己的想法去詮解《易》經。惠棟的《周易述》一書則以漢儒之說為本，詳加考證，雖未必能得漢儒之說的全貌，但其說有所根據，並非空想而發。在此「根柢」一

¹⁴ 《總目·學春秋隨筆》提要，卷31，頁805。

¹⁵ 毛奇齡：〈與馮山公論孟書〉，《西河集》卷18，（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頁14。

¹⁶ 《總目·周易述》提要，卷6，頁174。

詞不只表述惠棟之學有所本源，《總目》更將其與「空談」相對，以表示正面肯定之意。

就以上所舉的例子來看，《總目》在使用「根柢」一詞時有幾個特色：一、「根柢」不僅是純粹的描述性詞彙，而通常是帶有正面評價性的意味。二、在使用的對象上，《總目》稱許其書具「根柢」的通常是指清代漢學學者如萬斯大、惠棟等人。這正也印證了四庫館臣是較偏向漢學的立場。三、在《總目》中與「根柢」相對，具有負面評價的詞語通常是「空談」，這亦近於清代漢學家批評宋學「空疏」的說法。四、「根柢」與「空談」這一對詞彙本是《總目》用於對詮解儒學經典方法的判斷，它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詮解典籍的方式與態度。

有趣的是四庫館臣並沒有將「根柢」一詞侷限在對儒學經典詮釋爭論的範圍內，在《總目》中「根柢」一詞有更寬廣的用法，其甚至延伸至對文章作品的批評。如言：「放在元祐諸人之中，學問最有根柢，其考證論議，可取者多，究非江湖末派鉤棘字句、以空談說詩者比也¹⁷。」在這段文字中，《總目》採取與經部提要中相似的論述方式，認為《中山詩話》不論其考證或議論都有學問上的來源，宋末江湖派以「空談」方式論詩是遠遠不及(宋)劉攽之作。「詩話」的內容可以很廣泛，文學掌故、批評與心得均可存於其中¹⁸，《總目》顯然認為縱使論及文學的詩話亦不可向壁虛造。又如其對《柳亭詩話》之批評為：「自三代以迄近人，凡涉於詩者，多所記錄，時以己意品題。而議論考據，多無根柢，猶明季山人之餘緒也¹⁹。」在評詩之時多僅表達自己的觀感，更重要的是在「議論考據」

¹⁷ 《總目·中山詩話》提要，卷 195，頁 5369。

¹⁸ 關於歷史中「詩話」的內容，依蔡鎮楚：《詩話學》（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 17-29 所述，詩話最原始指的是詩歌的故事，後又有詩論包含其中，其內容有「推溯詩派淵源、評論作家作品，摘錄詩歌佳句、漫談詩歌技法，記述詩人軼事，考證詩歌掌故，詮釋詩句僻典」（頁 18-19），內容相當廣泛。

¹⁹ 《總目·柳亭詩話》提要，卷 197，頁 5442。

時缺少「根柢」，四庫館臣認為(清)宋長白這種作風無疑是受到明末風氣的影響。由這兩則例子來看，有根柢是被讚揚的，反之則是被貶抑批評的。當然，若進一步來看，四庫館臣認為詩話中的「考證論議」要有根柢，其實亦無可厚非，因為關於文學之本事、典故之論說本亦應有所依據，不可望文生義憑空解說。就此而言，《總目》對詩話的評斷沿用詮解儒學經典的標準在思路上是一致的。這是《總目》「根柢」觀念進一步擴展至對文學評價方面的討論的明證。

《總目》對於飽學之士的文學成就常予以推崇，如其對唐朝楊炯文章的評價為：

傳又載其《駁太常博士蘇知幾冕服議》一篇，引援經義，排斥游談，炯文之最具有根柢者。知其詞章瑰麗，由於貫穿典籍，不止涉獵浮華。而《新唐書》本傳刪之不載，蓋猶本紀不載詔令之意，是宋祁之偏見，非定評也²⁰。

在舊《唐書·文苑傳》中載有楊炯的《駁太常博士蘇知幾冕服議》一文，而新《唐書·文藝傳》中則不錄此文。四庫館臣認為楊炯這篇文章是最有「根柢」的，因其駁斥蘇知幾「請制大明冕十三章，乘輿服」之說時，廣引儒學《易》、《書》等典籍為立說根據，從中可見楊炯的儒學涵養之深。從這樣的評述中，可見四庫館臣不僅認為典籍學養僅可供於考訂實事、解釋有憑而已，其對於文學創作亦產生一定的正面影響。在《總目》中這常常成爲一種判定文學成就的標準，如：

韶正色立朝，巋然耆舊。其文雖沿臺閣之體，而醇深雅正，具有根柢，不同於神瘠而貌腴……韶之風節雖不藉文章以傳，然文章亦足以不朽²¹。

(明)彭韶雖然身處高位，但文章創作屬四庫館臣不甚欣賞的臺閣體，但其作品文章字字均有來歷，這都是學問淵博、根柢深厚的緣故。這種強調由作者本身豐厚

²⁰ 《總目·盈川集》提要，卷 149，頁 3844。

²¹ 《總目·彭惠安集》提要，卷 170，頁 4434。

學養所自然而然產生優秀文字作品的看法，常是《總目》論述文學成就的方式：

應麟藉王世貞以得名，與李維楨、屠隆、魏允中、趙用賢稱「末五子」，所作《詩藪》，類皆附合世貞《藝苑卮言》，後之詆七子者，遂并應麟而斥之。考七子之派，肇自正德，而衰於萬歷之季，橫踞海內，百有餘年。其中一二主盟者，雖為天下所攻擊，體無完膚，而其集終不可磨滅。非惟天姿絕異，籠罩諸家，亦由其學問淹通，足以濟其桀驁，故根柢深固，雖敗而不至亡也。末俗承流，空疏不學，不能如王、李剽剽秦漢，乃從而剽剽王、李，黃金白雪，萬口一音，一時依附門牆，假借聲價，亦得號為名士，時移事易，轉瞬為覆瓿之用，固其所矣。應麟雖仰承餘派，沿襲頹波，而記誦淹通，實在隆、萬諸家上，故所作蕪雜之內尚具菁華。錄此一家，亦足以為讀書者勸也²²。

這段的内容頗豐，主要之意有：一、胡應麟的《詩藪》是附和明後七子中王世貞《藝苑卮言》主張的著作，而王世貞之名氣大於胡應麟，故胡之名氣實由依憑王世貞而得。二、後七子推舉前七子之「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擬古主張，雖然這個主張受到後人許多嚴厲的批評，但如王世貞、李攀龍由於本身學問廣博，故仍有一定的成就與地位。三、至於學後七子之人，因本身學養不足，僅依附流派之盛而得享大名者，一旦流風轉移，其作品亦無足掛齒。四、胡應麟在後七子受後人批評時，其亦不免受到波及，但因其本身學養遠超同儕，故其書中亦有不少可采之處，這亦是《總目》收錄《少室山房類稿》的原因。在這條提要中，除了呈顯四庫館臣對前、後七子後學的不滿外，更重要的是贊揚有典籍根柢者的作品，並認為這是文學作品不會因為時代風氣改移而被淘汰的因由。

事實上，《總目》常以「根柢深厚」做為贊揚文學成就的原因，但這所謂的

²² 《總目·少室山房類稿》提要，卷172，頁4501-4502。

「根柢」所指究竟為何？實有必要做一說明。《總目》所謂「根柢」大致可分為兩類，其中最多的是指典籍知識：

寅於《易》、《詩》、《書》、《春秋》、《禮記》、《周禮》皆有訓釋，又有《策要》、《史斷》諸書，頗究心於史學。又有《堯言》、《論林》、《蒐古集》、《格物編》諸書，亦兼講考證。故其文理極醇雅，而持論多有根柢，不同剽掇語錄之空談²³。

《總目》對《石門集》的提要中有兩個重點：一、認為梁寅文理持論醇雅且有根柢，「根柢」與「空談」相對而言。這種褒揚貶抑對比的方式無疑是沿用了四庫館臣在評論漢學、宋學經學研究進路上的區別。二、在說明梁寅之「根柢」時，《總目》指的主要是兩類的典籍：儒家的五經²⁴及史學相關典籍。《總目》對以典籍知識作為創作之「根柢」相當的注重，認為其影響力甚至可以超過師承：

天爵少從學於安熙，然熙詩文羸野不入格，天爵乃詞華淹雅，根柢深厚，蔚然稱元代作者。其波瀾意度，往往出入於歐、蘇，突過其師遠甚。至其序事之作，詳明典核，尤有法度。集中碑版幾至百有餘篇，於元代制度、人物，史傳闕略者多可藉以考見……蓋其文章原本由沈潛典籍、研究掌故而來、不盡受之於熙也²⁵。

蘇天爵的文學成就之所以遠遠超越其師安熙，因蘇天爵有「根柢」，尤其是序事的作品法度詳明，就是受到多讀典籍的影響。在此「根柢」指的是「典籍」、「掌故」。可見四庫館臣雖是堅持儒學正統觀念，但其所謂「根柢」未必僅集中在儒

²³ 《總目·石門集》提要，卷168，頁4363。

²⁴ 順帶一提的是《總目》用根柢一詞時所指典籍範圍極廣，其中當然最常被提及的是儒家的《易》、《禮》、《詩》、《書》及《春秋》相關典籍。但筆者極少發現《總目》用「根柢」來指四書。這可能亦與四庫館臣以五經學為主而宋明理學家以四書學為主的爭議有關。

²⁵ 《總目·滋溪文稿》提要，卷167，頁4317。

學的經學典籍，而廣泛的包含各種知識。類似的看法又見於對《苑洛集》的評論：

當正、嘉之際，北地、信陽方用其學提倡海內，邦奇獨不相附和，以著書餘事，發為文章，不必沾沾求合於古人，而記問淹通，凡天官、地理、律呂、數術、兵法之屬，無不博覽精思，得其要領，故其徵引之富，議論之核，一一具有根柢，不同掇拾浮華。……其他辨論經義，闡發《易》數，更多精確可傳。蓋有本之學，雖瑣聞雜記，亦與空談者異也²⁶。

(明)韓邦奇的學問興趣頗為廣泛，對地理、音樂、數術、兵書等等書籍均有心得，所以他的文章議論、引用均有「根柢」來源。在這「根柢」所指並非儒學的核心典籍，而是其他方技之書。對此更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漢學家與宋學學者在學術性格上有一極大的區別：即是漢學家更重視「道問學」，其甚至於超過對「尊德性」的強調。余英時更用「儒家智識主義」一詞來說明由理學轉到考證學的背後原因與動力²⁷。依此清儒漢學學者普遍有著廣泛的學問興趣，對於各種學問有許多不嫌繁瑣的深入研究與成果，並以此自傲。在這個脈絡下四庫館臣認為以各種學問內容為「根柢」的「瑣聞雜記」，較諸「掇拾浮華」、「空談」等著作價值更高，無疑亦是漢學宋學相互對比心態的展現。

《總目》使用「根柢」一詞時，除了指其學識豐富之外，第二種用法是指作者之人品存心：

游跋幾《奏議稿》曰：「紹興末，先生居會稽禹蹟精舍，某自敕局歸，無三日不進見，見必聞憂國之言，先生年過七十，聚族百口，未嘗以為憂，憂國而已。」據此，則幾之一飯不忘君，殆與杜甫之忠愛等，故發之文章，具有根柢，不當僅以詩人目之，求諸字句間矣²⁸。

²⁶ 《總目·苑洛集》提要，卷 171，頁 4471。

²⁷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龍門書局，1976 年），頁 17-19。

²⁸ 《總目·茶山集》提要，卷 158，頁 4069。

(宋)曾幾於南宋高宗時歷任江西、浙西提刑，但因與秦檜意見不合，去職後住在上饒的茶山寺，故其自號茶山居士。以人品論，曾幾不屈從秦檜，為世人所稱頌。陸游嘗從學於曾幾，深知曾幾品格與心意，所以陸游說曾幾不憂上百族人之生活，但憂君愛國。四庫館臣認為曾幾這種時時心存天下國家興亡的心志即是其為文章的「根柢」。此種由心志而發為文章的根柢說與前文所舉以典籍知識為根柢有所不同。又如對《蕭茂挺文集》之提要言：

今考穎士當祿山寵盛之時，嘗與柳并策其必反，既而言驗，乃詣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獻策守禦，納言不能用。祿山別將攻南陽，山南節度使源洧欲遁，穎士力持之，乃堅意拒賊。永王璘嘗召之，不赴。而與宰相崔圓書，請先防江淮之亂，既而劉展又果叛。其才略志節，皆過於人，不但如晁氏之所云。文章根柢，固不僅在學問之博奧也²⁹。

根據新《唐書·文藝傳》的記載，蕭穎士四歲屬文，成名後亦有趙匡、柳并等人對其執弟子禮，有「蕭夫子」之稱。但因不附權相李林甫，又作《伐櫻桃賦》以譏之，所以「流播吳、越」等地。蕭穎士曾告訴柳并說安祿山「負寵而驕」而即將為亂，其後果然發生安史之亂。之後對天下局勢種種的預判亦一一實現，晁公武說蕭穎士能知幾先，四庫館臣認為蕭穎士文章的「根柢」不僅在於學問博奧而已，更是在其才略志節。這亦是以其人品心志為根柢之意。

統而言之，《總目》所謂文章之「根柢」大略指涉兩種內容：一是學問典籍，二則為人品。其中關於《總目》對於人品之高低與文學成就之間的關係，歷來討論極多³⁰，其影響較為全面，在此不煩多言。至於學問典籍對於文學創作成果的

²⁹ 《總目·蕭茂挺文集》提要，卷148，頁3866。

³⁰ 如周積明，《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頁211-215。涂謝全：〈論《四庫總目》文學批評的經世價值取向〉（《重慶郵電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4期）。鄭明璋：〈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文學批評學〉（《唐都學刊》，2005年5月）。均有論

影響則需進一步的討論。

前文所引述《總目》關於學問典籍對文學成就影響的內容，大致上都集中在對於「文章」的論述。若以文體概念而言，即是所謂的散文。在傳統文學概念中，散文內容極廣，表章奏議、史論考證、抒情言志等文章都可以是散文。如前文所引《總目》盛稱具根柢之文不少都是與學術考訂、政事論述相關³¹。此類文章在內容上需有學問典籍的依據，自然較為合理。但是在《總目》的文學範疇中除了「文」之外，還有一種非常重要的文類——詩。四庫館臣對於「根柢」在詩所產生的影響，與對散文(或文章)的看法有些差異。

三、根柢、語錄對詩文的創作影響

在中國文學理論史中，對不同文體有不同風格的要求起源甚早，曹丕《典論·論文》即開其端，其言「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雖是簡單的區分，但也開創了文體風格學的研究。之後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

述《總目》對人品與文學成就關連的看法。簡而言之，《總目》大部份都認為文章關乎人品，但在少數的例子中亦有人品與文章相互分離的情況。

³¹ 對於政事相關文章的重視可由《總目》對於(清)陸隴其《三魚堂文集》的提要中看到：「惟是隴其一生，非徒以講明心性為一室之坐談，其兩為縣尹，一為諫官，政績亦卓卓可紀，及體用兼優之學，而銓等乃以奏議公、牘確然見諸行事者，別為外集。夫詩歌非隴其所長，列之外集可也。至於聖賢之道，本末同原，心法、治法，理歸一貫。《周禮》皆述職官，《尚書》皆陳政事，周公、孔子初不以是為粗跡，即黃榦編朱子詩文，亦未嘗薄視論政之文，揮而外之。銓乃徒知以《太極論》冠篇，欲使隴其接跡周子，而以其循績別為外集，尊空言而薄實政，是豈隴其之旨乎！」(《總目》，卷 173，頁 4541-4542。)對於將陸隴論政之文編為外集深為不滿，認為論政之文是「實政」，是不可忽視的作品。

別論》與劉勰《文心雕龍》對此均有精到的見解³²。相對而言，現今學界對《總目》中文學思想之研究多為整體方向的討論，較少對《總目》因不同文體而提出不同風格看法做深入研究。就筆者所見，僅有楊有山：〈論《四庫全書總目》的文體研究〉一文，楊氏在文中提出《總目》對文章有「主理尚用」的要求，對《詩歌》則強調「自抒性情」，詩與文章是有「明顯區別」³³。可見《總目》清楚的對不同文體亦有不同風格的要求。同樣的，因不同文體有不同美學風格的差異，故學識典籍的「根柢」，對於文學創作上亦在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總目》對於宋明以來因道學「語錄」盛行而對文學產生的負面影響深惡痛絕，有著非常嚴厲的批評，如其在(宋)王炎所撰的《雙溪集》提要中言：

其詩文博雅精深，亦具有根柢……議論醇正，引據典確者，尚不可悉數。
蓋學有本原，則詞無鄙誕，較以語錄為詩文者，固有蹈空、徵實之別矣³⁴。

又於(元)吳景奎所撰之《葯房樵唱》提要中言：

宋濂為作《集序》，亦極相推挹，特編次時失於簡汰，如《偶成》詩云：「挾才勝德世所薄，寧我負人天可欺，士之言行苟如此，聖經賢傳將奚為？」
殆劉克莊所謂有韻語錄，殊不入格³⁵。

這其中有兩個特別引人注意的觀點：一、四庫館臣在此明指語錄對文學產生了許

³² 參見詹鍇：《文心雕龍的風格學》（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頁128-129。

³³ 《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6月。楊氏之文有簡略論述《總目》主張對文章與詩詞之風格有不同要求，但其主要論述重點放在對詩詞與曲體性之別的辨析比較上，與筆者以下要論述的重點有異。並且楊氏認為《總目》對詩的體性是「自抒性情」的看法，筆者也未必完全認同，因就筆者後文所述，《總目》對詩之創作至少有偏重「學問」與「自然」兩種不同的區別，故難以一概而論。關於《總目》對詩的體性問題複雜，當另撰文討論。

³⁴ 《總目·雙溪集》提要，卷160，頁4116-4117。

³⁵ 《總目·葯房樵唱》提要，卷167，頁4326。

多不良的影響，於此與根柢相對的不是前文的「空談」而是「語錄」，而語錄亦正也是宋明理學一個明顯的特徵³⁶，所以這亦為《總目》重漢學貶宋學態度的延申。二、《總目》對於以語錄為詩文者不滿，特別是在詩的領域中，《總目》引用劉克莊「有韻語錄」的評語，認為以語錄作詩根本是「不入格」³⁷。此所謂的「不入格」指的是不合詩的本質，在《總目》中「不入格」最常使用在對詩的批評³⁸，尤其是對《擊壤集》以下「惟涉理路」的詩風更是不滿。《擊壤集》為宋朝理學大師邵雍的集子，其詩「以論理為本，以修詞為末」，與唐詩有極大的差異。也正因為如此，所以《總目》說其「脫然於詩法之外」，也就是批評其不以詩的常法為詩。但四庫館臣認為對邵子而言，詩僅為表意之工具，所以對《擊壤集》本身並沒有多加批評³⁹。但對後學競相以俚俗之語、言理之詩相互標榜則深不以為然。如其對《濂洛風雅》中所標舉的準則即十分不滿：

自真德秀《文章正宗》出，始別為談理之詩。然其時助成其稿者為劉克莊，德秀特因而刪潤之。故所黜者或稍過，而所錄者尚未離乎詩。自履祥是編出，而道學之詩與詩人之詩千秋楚越矣。夫德行、文章，孔門即分為二科，儒林、道學、文苑，《宋史》且別為三傳。言豈一端，各有當也。以濂、洛

³⁶ 當然「語錄」一體並非是宋明理學家所特有，佛教亦有語錄一體。但從《總目》所批評的語錄來看，其主要是指宋明理學家之語錄。

³⁷ 《總目·薛文清集》提要，卷 170，頁 4427，中言：「劉克莊集有《吳恕齋文集序》曰：『近世貴理學而賤詩賦，間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耳。』則宋人已自厭之矣。」亦表示對以語錄作詩深為不滿。

³⁸ 「不入格」一詞在《總目》集部中的用法大部份都是針對詩而言，其中有少數幾個例子是泛指文學作品，如對(元)劉鶚評語為：「其文稍不入格」(《總目·惟實錄集》提要，卷 167，頁 4294。)說(明)徐敬德「詩文雖不入格」(《總目·徐花潭集》提要，卷 178，頁 4813。)這些都是在《總目》因其人品而推重其文的語意脈絡下所言，與專言語錄詩風「不入格」有所不同。

³⁹ 《總目·擊壤集》提要，卷 153，頁 3966。

之理責李、杜，李、杜不能爭，天下亦不敢代為李、杜爭。然而天下學為詩者，終宗李、杜，不宗濂、洛也。此其故可深長思矣⁴⁰。

從考鏡源流來看，(宋)真德秀的《文章正宗》應是最早特別標舉出「談理之詩」的選本，但其尚未完全脫離了詩的特質。至(宋)金履祥所編的《濂洛風雅》選集則完全以談理為主，悍然不顧詩本身所應具有的美學風格。這正是四庫館臣所極力批評的重點。《總目》對於「談理之詩」的不滿主要是從其用語粗鄙，多使用方言俚字入詩而起⁴¹，這使得詩在文字方面所應有的特質完全消逝。四庫館臣在理論上強調理詞並重⁴²，故對《文章正宗》以下後完全以理為主的詩風是全然無法認同的。《總目》並認為在以「理」為主的大旗下，責李白、杜甫之詩對天理缺乏體會，雖無人敢為李、杜發言，但此主張終究無法長久經過人情之考驗。因為詩之所以動人，比興文采均是重要的因素⁴³，極端主張以詩論理而不顧文采的主張，《總目》認為這是「不近人情之事」，而「不能強行於天下」⁴⁴。四庫館臣認為喜歡語文之美是人情之必然，道學家卻無視人的這種需要，僅僅以詩文內容是否見理做為好壞的唯一標準，而忽視了語文本身的美感，這根本是違反了人情

⁴⁰ 《總目·濂洛風雅》提要，卷 191，頁 5225。

⁴¹ 如言(宋)林之奇作品「無語錄粗鄙之氣」(《總目·拙齋文集》提要，卷 158，頁 4087。)稱贊(元)汪克寬之七言古詩，風格近於溫庭筠、李賀，「較諸演語錄以成篇，方言俚字無不可以入集者，亦殊勝之。」(《總目·環谷集》提要，卷 168，頁 4355。)

⁴² 《總目·環谷集》提要，卷 168，頁 4355。言：「文士之文以詞勝，而防其害理，詞勝而不至害理，則其詞可傳，道學之文理勝，而病其不文，理勝而不至不文，則其理亦可傳，固不必以一格繩古人矣。」

⁴³ 《總目·崇古文訣》提要，卷 187，頁 5118。言：「真德秀《文章正宗》以理為主，如飲食惟取饑饉，菽粟之外，鼎俎烹和皆在其所棄，如衣服惟取禦寒，布帛之外，黼黻章采皆在其所捐。持論不為不正，而其說終不能行於天下。」又云(宋)黃徹的詩有「風人之旨」，「非務以語錄為宗，使比興之義都絕者也。」《總目·碧溪詩話》提要，卷 195，頁 5380。

⁴⁴ 《總目·文章正宗》提要，卷 187，頁 5120。

⁴⁵。長久而言，道學家的這種主張必然不能獲得讀者普遍的支持。《總目》這種批評正亦呼應清儒常用「通情遂欲」來反對道學家「存理滅欲」的說法⁴⁶。更進一步來說，四庫館臣並不是絕對的反對以文談理，重點在於對「談理之詩」的反感。因為「談理之詩」錯置了不同文體本身的特質，故其引王士禎《居易錄》中對此類傳理為教之詩的批評：「如欲講學，何不竟作語錄⁴⁷！」來申明其立場。相對的，四庫館臣對於道學家之散文則說：

然宋自元祐以後，講學家已以說理之文自關門徑，南渡後輒轉相沿，遂別為一格，不能竟廢……披沙簡金，時有可採，宋人舊帙，固不妨存備一家也⁴⁸。

認為道學家的說理之文雖與傳統古文不類，但是創作者眾，其中亦有少數可採之處。不論是在語氣態度上，與前文批評以語錄入詩者均有明顯的差別。

事實上，四庫館臣認為學識根柢在不同文類在創作上所產生的影響並不盡相同：根柢佳對散文而言較有直接的助益，但對詩則未必。《總目》常以作者具有根柢來說明其文章之所以可取的原因。如對(明)魏校之《莊渠遺書》的評語為：「然校見聞較博，學術亦醇，故是集文律謹嚴，不失雅正。考據亦具有根柢，無忝于儒者之言。⁴⁹」魏校的考據具有根柢，故其主張或稍有缺失，但總體而言文章風格博醇雅正，充份顯示出儒者為文的特色。又如對(唐)李翱文章的評論為：

⁴⁵ 宋代道學家對文章的好惡不一，其中亦對文詞之美有非常極端強烈的批評者。其中尤以二程為顯。二程有「作文害道」之說，亦有「不欲作詩」的主張。參見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頁353及426。

⁴⁶ 張麗珠，《紀昀反宋學的思想意義》，頁268。

⁴⁷ 《總目·白沙詩教解》提要，卷175，頁4638。《總目》類似的批評尚見於《總目·方壺存稿》提要，卷163，頁4175。

⁴⁸ 《總目·本堂集》提要，卷164，頁4206。

⁴⁹ 《總目·莊渠遺書》提要，卷171，頁4467。

才與學雖皆遜愈，不能鎔鑄百氏皆如己出，而立言具有根柢，大抵溫厚和平，俯仰中度，不似李觀、劉蛻諸人有矜心作意之態。蘇舜欽謂其詞不逮韓，而理過於柳，誠為篤論。鄭獬謂其尚質而少工，則貶之太甚矣⁵⁰。

李翱雖問學於韓愈，但其詩文兩種文體的成就不同。早在宋朝的葉夢得即指出李翱不擅做詩，故世亦少見其詩作，更不用說有任何傑出的作品。李翱的散文則以論理見長，但亦不至於如鄭獬所言的「尚質少工」。其成就雖不及韓愈，但因具有根柢，所以其文溫厚中度，超越李觀、劉蛻等人。就李翱這個例子來看，四庫館臣顯然認為學問根柢對散文的創作是有助益的，至於作詩則沒有任何正面的影響。又如對(宋)翟汝文的評語為：「今觀其文，大都根柢深厚，措詞雄健，所謂無一字無來處者，庶幾足以當之，非南宋表啓塗飾剽掇之比⁵¹。」翟汝文與蘇軾、黃庭堅、曾鞏等北宋大文學家有所往來，亦受其影響。加上翟氏本身好學不倦，所以《忠惠集》中雖無詩作，但就散文而言其成就亦不可忽視。而這正是由其學識根柢發而為文的關係。

一個人的學識根柢端視其努力與興趣，但此根柢在創作詩文時所能發揮的作用卻不盡相同。如四庫館臣對金履祥的詩、文的評價即有高下之別：

其詩乃彷彿《擊壤集》，……所作均不入格，固其所矣。至其雜文，如《百里千乘說》、《深衣小傳》、《中國山水總說》、《次農說》諸篇，則具有根柢。其餘亦醇潔有法，不失為儒者之言。蓋履祥於經史之學研究頗深，故其言有物，終與空談性命者異也⁵²。

金履祥除了編有《濂洛風雅》外，尚有自著《仁山集》6卷。在這段評語中有三點值得注意：一、金履祥之詩「不入格」，這與前文原則一樣，因金氏主張以理

⁵⁰ 《總目·李文公集》提要，卷150，頁3881。

⁵¹ 《總目·忠惠集》提要，卷156，頁4039。

⁵² 《總目·仁山集》提要，卷165，頁4236-4237。

爲詩，而且在創作上也遵循這樣的看法，所以其詩自然不爲四庫館臣所接受。二、在文章方面，四庫館臣則認爲金氏之文「醇潔有法」，因金履祥對於「經史之學」有頗深的研究，發而爲文與「空談性命」者不同。這又與《總目》以「有根柢」做爲文章的正面評價一致。三、總而言之，四庫館臣認爲金履祥是學有「根柢」之人，此根柢有益於文章，但卻對詩作無所助益。也就是說學問之根柢對不同的文體創作有著並不一致的影響：文較直接，詩則未必。換言之根柢與爲文的關係較爲單純，而與詩的關係則較爲複雜。

關於學問根柢與詩作間的複雜關係，可以從另一個面向來思考：詩是否一定要依憑學問根柢才可能成爲好的作品？關於這個問題可以從《總目》對清初王士禎、朱彝尊與施閏章三位重要詩人的評論中得到更多的釐清。《總目》對王士禎的評語爲：

士禎談詩，大抵源出嚴羽，以神韻為宗。……當我朝開國之初，人皆厭明代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於是談詩者競尚宋、元。既而宋詩質直，流為有韻之語錄；元詩綉豔，流為對句之小詞。於是士禎等以清新俊逸之才，範水模山，批風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天下遂翕然應之。然所稱者盛唐，而古體惟宗王、孟，上及於謝朓而止……故國朝之有士禎，亦如宋有蘇軾，元有虞集，明有高啟⁵³。

這段提要的內容頗爲豐富，大致而言有幾個要點：一、對宋、元詩風有一整體性的描述，其中亦呈顯四庫館臣不滿宋、元詩風的理由，特別是對宋詩以「有韻之語錄」明加標示，以凸顯其不滿。二、對王士禎標舉「神韻」之說的來源做一說明，並認爲王漁洋提倡盛唐詩風主要歸宗於王維、孟浩然兩人，而非李白、杜甫。三、王士禎不僅詩論影響當時，其詩之創作亦有極高成就，並舉宋蘇軾等偉大詩

⁵³ 《總目·精華錄》提要，卷173，頁4527-4528。

人以爲類比。四庫館臣對王士禛的詩幾無惡評，但對其古文則有不同的看法：「士禛以詩名一時，而古文特以天姿朗悟，自然修潔，實則非所專門⁵⁴。」由這個評語來看，《總目》一方面強調王士禛本身天賦極高，一方面又說文則非王之所長，這中間的環節實是因爲學問根柢對不同文類所造成不同的影響效果，詩的成就未必要以深厚的學問爲根柢。這可以從對比《總目》對朱彝尊的評語中得到更清楚的明證：

趙執信《談龍錄》論國朝之詩，以彝尊及王士禛爲大家，謂王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之學博，而才足以運之。……至所作古文，率皆淵雅，良由茹涵既富，故根柢盤深。其題跋諸作，訂訛辨異。本本元元，實跨黃伯思、樓鑰之上。蓋以詩而論，與王士禛分途各驚，未定孰先。以文而論，則漁洋文略，固不免瞠乎後耳⁵⁵。

趙執信亦爲清代名詩人，所著《談龍錄》中對王士禛、朱彝尊爲詩一以才一以學爲先的評論，四庫館臣亦深以爲然。四庫館臣更進一步評述若僅以詩作而論，王士禛、朱彝尊各有所長，未有高低。但若以文相較，則王漁洋遠在朱竹垞之後。王、朱兩人在詩、文兩種文體的成就上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差別，主要是因爲王士禛在根柢學養上所有不足，如《總目》即指出王所著之《唐賢三昧集》中有「誤收」、「全不講於地理之學」等問題，雖言：「士禛自品詩格，原不精於考證⁵⁶。」以漁洋所長不在考證爲其說解，但對王士禛於學上不足的論斷則是清楚可見的⁵⁷。相對的，《總目》言朱彝尊之古文「根柢盤深」，盛稱其題跋等作在考訂上的

⁵⁴ 《總目·漁洋文略》提要，卷182，頁4945。

⁵⁵ 《總目·曝書亭集》提要，卷173，頁4531-4532。

⁵⁶ 《總目·唐賢三昧集》提要，卷190，頁5205。

⁵⁷ 這並非指四庫館臣認爲王士禛空疏無學，而是王士禛在史實、地理等方面的考證能力較弱。關於王士禛在《總目》中地位問題，參見楊晉龍：〈王士禛在《四庫全書總目》中的地位初探〉，《中國文學研究》，第7期，1993年5月。

成就超過宋朝的黃伯思與樓鑰兩位名家。尤有甚者，朱氏在學術史上的成就亦是非凡，其名著《經義考》一書雖對圖書或存或亡的記述略有缺失，但《總目》言其：「博識多聞，學有根柢，復與顧炎武、閻若璩頡頏上下。凡所撰述，具有本原⁵⁸。」將朱彝尊的學問與清初漢學大師顧炎武、閻若璩等人放在同一水準，可見四庫館臣對朱彝尊學問的推崇。也正因朱彝尊之學問根柢較王士禛深厚，所以在散文成就亦遠越王士禛。從《總目》對王、朱兩人詩、文的不同評價中，或許可以進一步討論一個問題：這是否意味著《總目》認為在詩的創作上至少存在著兩種不同的進路？因王、朱兩人根柢深淺有別，所以文有所差異，但詩則不分高下，其中或有不基於根柢而成的佳妙詩作。

《總目》對於學問根柢與詩的創作之間的關係在《學餘堂文集》提要中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說明：

閻章嘗語士禛門人洪昇曰：「爾師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見。吾詩如作室者，瓴甃木石，一一就平地築起。」士禛亦記於《居易錄》。平心而論，士禛詩自然高妙，固非閻章所及，而末學沿其餘波，多成虛響。以講學譬之，王所造如陸，施所造如朱。陸天分獨高，自能超悟，非拘守繩墨者所及；朱則篤實操修，由積學而漸進。然陸學惟陸能為之，揚簡以下，一傳而為禪矣。朱學數傳以後，尚有典型。則虛悟、實修之別也⁵⁹。

施閻章亦為清代詩學名家，與王士禛相互欣賞。但其對詩的創作歷程則與王漁洋有所不同，施言王為「彈指即見」，其己則是「一一就平地築起」，一由天賦一由

⁵⁸ 《總目·經義考》提要，卷 85，頁 2225。《總目》批評《經義考》：「至所註佚、闕、未見，今以四庫所錄校之，往往其書具存，彝尊所言不盡可據。」但這是因為「冊府儲藏之祕，非人間所得盡窺。又恭逢我皇上稽古右文，蒐羅遺逸，瑯嬛異笈，宛委珍函，莫不乘時畢集，圖書之富，曠古所無。」這是「其勢則然」，並非是朱彝尊本人的學養問題。

⁵⁹ 《總目·學餘堂文集》提要，卷 173，頁 4525。

學養。這種看法亦獲得王士禛的首肯。《總目》則對施閏章之說進一步發揮，提出有兩種詩人的創作方式：王士禛之詩「自然高妙」，相對之下施閏章則是屬於學識型的作者⁶⁰。《總目》並以陸九淵與朱熹做為比喻：王士禛如陸九淵反求本心直截了當，而施閏章則如朱熹格物窮理日見其功⁶¹。這兩者為詩之進路不同，所以根柢對其詩作所造成的影響亦有所不同。對王士禛型的作詩者來說，根柢深厚與否與其詩作關係較淺⁶²；但對於施閏章型的作詩者而言，根柢深厚與否則與其詩作密切相關⁶³。依理而言，這兩種不同創作詩的進路到了極致，應如王士禛與朱彝尊之詩並無高下之別一般。但是《總目》接下來則說王士禛為詩的方式較容易流為「虛悟」，這其中又似乎又透顯出四庫館臣以評述宋明理學的方式來論評詩作的意味。

四、結語

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儒學的勢力極大，經學影響亦深入各個領域。以本

⁶⁰ 筆者所述的兩種區分並非截然不同，只是偏重點不同。也就是說王士禛並非完全無學，施閏章亦非完全無才。只是兩者在型態有所分別而已。

⁶¹ 當然陸九淵與朱熹的差異相當複雜，其差異並不止於工夫修養論方面，在此僅以這兩個概念加以簡單說明。

⁶² 《總目》對王士禛雖言其詩「自然高妙」，但亦表示若將王詩「較以《十九首》之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則有天工、人巧之分矣。」（《總目·精華錄》提要，卷 173，頁 4528。）可見古詩十九首較王詩更加的「自然高妙」。

⁶³ 《總目·懷清堂集》提要，卷 173，頁 4543。言：「今觀二家之集，朱彝尊學問有餘，而才力又足以運掉，故能鎔鑄變化，惟意所如。右曾才足肩隨，而根柢深厚則未免稍遜，齊驅並駕似未易言。」對浙中詩派的湯右曾與朱彝尊兩人的評論就認為湯才與朱相近，但根柢稍遜，所以詩的成就也不如朱。這即是根柢與詩的成就相關的例子。

文所論及的範圍而言，四庫館臣的根柢觀雖由經學而發但不僅止於經學，其對於文學討論的影響大致有以下三點：

- 一、論述方式的援引：有些原出於經學論述時所使用的對比與方式，《總目》將之援引至文學的相關討論。如將「根柢」與「空談」的對比、對「語錄」的不滿、對朱熹與陸九淵學術性格的比較等等，從這些詞彙最初使用的場域來說，原是用於經學爭論上的論述。但四庫館臣在對文學的相關討論時，亦常使用這些名詞概念來說明或支持其論斷。雖然未必全然合於原本經學中所使用的意思，但這種跨越不同學術領域的援引，即見其受到經學的影響，亦同時增加了討論文學內容的豐富度。
- 二、文學成就的判斷標準：四庫館臣以漢學之姿攻擊宋學最力的不外兩點：束書不觀空談心性與不近人情，故《總目》中有針對性的以主張博學返古與通情遂欲予以反駁。在博學返古方面，《總目》對學有根柢的作者文章幾乎毫無例外的加以褒揚，而對空談心性者多所批評。又對因理學盛行而產生的「惟涉理路」的詩風大加批評，認為以理為詩是不近人情的主張，故必去之而後快。這些對文學成就的評斷無疑是受到其經學立場的影響。若從文學價值的本身是否受到重視觀點來看，經學家(尤其是道學家)因其本身學問焦點多集中在對天理、政治、學問等等的討論上，所以對文學創作不以為意甚至多所貶抑。這種情況自揚雄將賦視為「童子雕蟲」而有「壯夫不為」⁶⁴的鄙視與後悔至程頤「作文害道」之說，雖強弱不一，但均對於用心力於文章辭賦沒有好感。四庫館臣雖以經學名家，但是其不廢文學，並進一步提供了文采為人情所喜一個根源性的說法，這可以說是為藝術美感的價值在人間的價值譜系中提供了更堅實的基礎。
- 三、由根柢觀發展而出的文體風格與創作論述：經學家通常較具學問根柢，所以

⁶⁴ 揚雄：《揚子法言·吾子》（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年《四部叢刊初編》本），卷2。

其文章中引經據典，毫不空言。但《總目》也注意到經學家之文學成就類型畢竟與文士不同，根柢對文章與詩兩種不同文體的影響亦有差別，《總目》認為學識對不同文體在創作上所產生的效果即不盡相同。更進一步來說，不同類型的作者與詩作是否同樣需要深厚的學問根柢亦不可一概而論。若從文學理論史的角度來看，從《文心雕龍》之後即少有兼備深入論述各種不同文體的著作。一般而言，論詩者多而論文者少，論詩者亦常將其對詩的主張延伸至其文論，更無論兼論詩文時能將詩文兩者分離而各論述其在創作上的種種不同。四庫館臣在撰述《總目》之時，面對歷代眾多不同的文學品類與作者，自然有較寬宏的視角，不但不會以一蓋全，且能深切了解各種不同的文體自有其理路。故不但從創作論的角度上分別了學識根柢對詩與散文不同程度的影響，也間接的從作者論的角度區辨了不同類型的作詩者各自的特色。這對通常傾向以單一化視角來涵蓋所有文體的創作論而言，《總目》所展現的不啻是個更完備也更複雜的文藝理論體系。

《總目》代表了清乾隆時期重要的學術成就與看法，其以儒家經學觀為骨幹的觀點固無庸贅言，但其亦對文學問題有種種深入的討論。這些問題不論是受經學觀影響而發，抑或是原即為文學內部早已存在的討論，四庫館臣再援用經學概念、用語更以豐富其論述內容。《總目》中的文學思想因牽涉到不同領域間所產生的交互影響，確值得我們繼續深入探討。

Studies on gen-di's connotation in the SiKu QuanShu superorder

Liu Te-Ming*

Abstract

This report main to discuss the problem about the The SiKu QuanShu superorder 四庫全書總目 how to use the gen-di 根柢 this term.First, We find gen-di this term his original idea. In the second place, search in The SiKu QuanShu superorder how to use the gen-di to expressions' meaning.Gen-di this concept thought's affection to literature.This report discuss prose and poem two type of writing.Especially discussion on formula for creation.

Keywords :The SiKu QuanShu superorder,gen-di,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Han-Confucianism,Neo-Confucianism.

*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tion, Centr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